

## 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

丁从明<sup>1,2</sup>, 陈仲常<sup>1</sup>

(1.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 重庆 400030; 2.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30)

**摘要:**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 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 文章通过构建区域间追赶模型指出: (1) 财政分权在带来区域竞争激励并促进增长的同时, 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 从而使得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倒U形”曲线状。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并不一样, 不同压力来源可能诱发出地方政府的不同努力水平。(2) 利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 通过构造四类财政分权指标, 证实了分权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且依据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基本推论。

**关键词:** 财政分权; 区域竞争; 倒U曲线

**中图分类号:** F061.5; 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08)10-0076-11

### 一、引言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 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 中国保持了高速增长, 在惊呼“中国奇迹”的同时, 理论界提出了大量的假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制度安排之一的财政分权体制, 受到了广泛关注。早在1993年, 许成钢、钱颖一就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经济在组织意义上的M型组织特征, 调动了作为“块块”部门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Xu和Qian, 1993; Xu、Maskin和Qian, 2000)。更具体的机制包括通过对地方政府的分权, 加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增加区域之间的竞争, 从而限制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行为(Qian、Roland, 1998)。但是分权一定可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吗? 同样是财政分权,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绩效表现迥异, 缺少强有力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分权并不必然会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中国式分权成功的关键在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Blanchard、Shleifer, 2001), 尤其是政治体制上官员晋升制度(周黎安, 2007)。在地方政府官

收稿日期: 2008-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Y071)

作者简介: 丁从明(1979—), 男, 江苏淮安人,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教师,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陈仲常(1949—), 女, 重庆人,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员的晋升主要取决于以 GDP 为主的考核机制下,经济绩效好的地区的政府官员晋升较快,任期较长,反之则较短(Li、Zhou, 2005),这种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区域经济竞争的动力,或特殊的“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路径(张军, 2008)。但是蔡洪滨(2005)指出分权促进竞争的区域同质性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得到满足,由于初始禀赋结构上的差异使得落后根本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所以期望通过分权来达到竞争的目标往往不能实现。若考虑到规模报酬递增的可能性,分权的竞争效应可能会进一步被弱化(陆铭等,2004)。

实证研究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争论的分歧主要在分权指标的度量,张涛、邹衡甫(1998)使用 1978—1992 年的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分权促进增长的假说,他们认为分权可能导致具有外部性的政府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的下降;但是林毅夫、刘志强(2000)利用 1970—1993 年的数据获得了不同的结论,后者使用了分成率指标。金和辉、钱颖一等(2005)利用 1982—1992 年省级数据证实分权调动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从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张晏、龚六堂(2006)利用更为完整的数据集,进一步证实财政分权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但是正如周黎安(2007)指出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不仅存在于中央和省级关系中,还存在于省与市、县、乡镇财政关系中,这类类似于企业的分包制度,层层分包。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充分利用县级面板数据,将研究从省级层面推进到县市层面,分析地区内省级部门向县市的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此外,现有文献过多关注分权带来的竞争激励,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经济发展绩效,但是正如张军(2008)指出,由分权驱动的地方竞争为什么一定是趋好的?而不是趋坏的?竞争就一定会带来增长吗?或进一步追问:当面临竞争压力时,不同的经济主体会采取相同的反应模式吗?如果不是,地方政府的刺激反应模式中又存在什么样的可识别的规律。本文认为一些比较落后地方的政府之所以“破罐子破摔”,可能不仅仅由于禀赋结构的差异或规模报酬递增使得落后地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机会渺茫,从而降低其激励效益的原因。虽然上述原因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分权对落后地区刺激较低,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分权的增长效应明显呈现倒 U 形曲线状?本文揭示倒 U 形分权效应曲线的逻辑在于:财政分权以及政治晋升的锦标赛带来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并不一样——落后地区要实现追赶;发达地区需要保持领先优势;而发展中地区既要避免被落后地区赶超,又希望能够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跨越,从而兼具两种竞争压力。不同的压力来源进一步诱发地方政府不同的努力水平,并进而产生类似“倒 U 形”的分权效益曲线。

## 二、分权、竞争与增长:一个分析性框架

这里将建立一个分析性框架:理论模型显示财政分权并不会一视同仁地

促进各个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这主要源于分权导致的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晋升激励强度,从而诱发不同的努力水平,平均而言,中等发达地区的分权效果要好于最穷和最富裕的地区,这将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地区收入水平呈现倒 U 形状。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可将不同地区归类为:落后地区、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收益显然存在差异:政治晋升的锦标竞赛意味着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地方政府官员收益最高(周黎安,2004、2007),上级政府按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对下级地方官员的晋升(Li、Zhou,2005),所以我们假设地方政府官员享受的经济和政治的收益依据其经济发展水平而依次递增。如图 1 显示:收益的相对差别部分来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的差距,但更为主要的来源是现有官员的晋升激励和任期长度;其次,在图 1 中, $\pi_{-1}$ 、 $\pi_0$ 、 $\pi_1$  的相对位置只反映了既定的分权程度,或既定的激励机制的安排。地方政府收益的相对位置,显然会随着不同程度的分权水平而发生变化,在图 1 中如果固定  $\pi_{-1}$ 、 $\pi_1$  的位置,则  $\pi_0$  会随着对地方政府的更大程度的分权或地方政府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而向左移动。由于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是基于相对业绩的锦标制度,GDP 水平名列前茅的地区获得最高的政治收益,“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多数都是输家”(王永钦,2007),此时再区别第二、第三名的意义已经不大。Aghion 等(2005)在一个不同框架下指出,随着市场竞争的强化,处于中间位置的水平部门收益将会相对下降。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权以及强调以 GDP 考核来决定政府官员晋升的激励制度的强化,模拟为中等地区政治收益  $\pi_0$  的相对下降,具体见假设 1 的表述。



图 1 地区相对收益分布

假设 1: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收益分别为  $\pi_{-1}$ 、 $\pi_0$ 、 $\pi_1$ ,且满足  $\pi_{-1} < \pi_0 < \pi_1$ ,将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总的收益差距  $\pi_1 - \pi_{-1}$  标准化为 1,则  $\pi_1 - \pi_0 = \Delta$ ,  $\pi_0 - \pi_{-1} = 1 - \Delta$ ,  $\Delta \in [0, 1]$ ,更加严格的分权激励意味着  $\pi_0 \rightarrow \pi_{-1}$  或  $\Delta \rightarrow 1$ 。

既有的收益格局、体制安排决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是对既有收益分配制度的合理反应。设  $n_{-1}$ 、 $n_0$ 、 $n_1$  分别表示不同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 $n_i \in (0, 1)$ ), $n_i$  取决于其追赶(Catch-up)上一级别对手收益增加(或被追上的收益损失),追上的概率(或被追上的概率)以及追赶的成本  $c(n_i)$ 。具体而言,对于落后地区,努力水平  $n_{-1}$  取决于追上对手的收益、可能性和相应的成本,如果  $\pi_0$  与  $\pi_{-1}$  之间差距较小,而追赶的成本较高,落后地区可能更愿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参加比赛;对于发展中地区,分权带来的竞争压力既包括对领头羊的追赶,还包括保持优势从而不被追随者追上;对于发达地区,由于

其本身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压力主要来源于不被追随者追上。我们还假设一旦领先者被追随者追上，那么他将失去领先的地位，并只能获得  $\pi_0$  的收益；根据图 1 和上面分析，可以建立地方政府在分权体制下的期望收益方程：

$$\begin{cases} V_{-1} = (1 - p_{-1})\pi_{-1} + p_{-1}\pi_0 - c(n_{-1}) \\ V_0 = p_{-1}\pi_{-1} + (p_1 - p_{-1})\pi_0 + (1 - p_1)\pi_1 - c(n_0) \\ V_1 = (1 - p_1)\pi_0 + p_1\pi_1 - c(n_1) \end{cases} \quad (1)$$

其中： $V_{-1}$ 、 $V_0$ 、 $V_1$  分别表示落后地区、发展中地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预期收益，我们假设地方政府为风险中性者。 $p_{-1}$  表示落后地区追上发展中地区的可能性，没有追上的概率为  $1 - p_{-1}$ ，所以落后地区的期望收益  $V_{-1} = (1 - p_{-1})\pi_{-1} + p_{-1}\pi_0 - c(n_{-1})$ ， $c(n_{-1})$  为追赶的成本函数； $p_1$  表示发达地区保持领先地位的概率，被追上的概率为  $1 - p_1$ ，被追赶上后的收益下降为  $\pi_0$ ，所以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期望收益  $V_1 = (1 - p_1)\pi_0 + p_1\pi_1 - c(n_1)$ ；发展中地区在竞争中可能存在三种可能性：(1) 被追上，概率为  $p_{-1}$ ；(2) 追上发达地区，概率为  $1 - p_1$ ；(3) 保持现状，概率为  $p_1 - p_{-1}$ ，所以发展中地区政府期望收益  $V_0 = p_{-1}\pi_{-1} + (p_1 - p_{-1})\pi_0 + (1 - p_1)\pi_1 - c(n_0)$ 。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引入假设 2。

假设 2：落后地区实现追赶的概率  $p_{-1} = p_{-1}(n_{-1}, n_0)$  和发达地区保持现状的概率  $p_1 = p_1(n_1, n_0)$  以及努力成本  $c(n_i)$  是连续可微函数，并满足  $\partial p_{-1} / \partial n_{-1} > 0$ ， $\partial p_{-1} / \partial n_0 < 0$ ； $\partial p_1 / \partial n_1 > 0$ ， $\partial p_1 / \partial n_0 < 0$ ； $\partial c / \partial n_i > 0$ ， $\partial^2 p - 1 / \partial n_i^2 > 0$ 。

为简化起见，取  $p_{-1} = 1 - e^{-n_{-1}/n_0}$ ， $p_1 = 1 - e^{-n_1/n_0}$ ， $c(n_i) = n_i^2/2$ ，分别对 (1) 式中的期望收益求偏导数， $\partial V_i / \partial n_i = 0$ ； $i = -1, 0, 1$ ，整理得：

$$\begin{cases} n_0 n_{-1} e^{-n_{-1}/n_0} = 1 - \Delta \\ n_0 n_1 e^{n_1/n_0} = \Delta \\ n_{-1}^2 + n_1^2 = n_0^2 \end{cases} \quad (2)$$

(2) 式有三个方程和三个未知数，由于本文只对地方政府的相对努力程度感兴趣，只需要考察  $n_{-1}$ 、 $n_0$ 、 $n_1$  的相对大小及其变化，所以可以将  $n_0$  标准化为 1，并有如下两个性质：

性质 1：在分权框架下，为了实现追赶和担心被追赶，发展中地区的努力程度最高。依地区发展水平对努力水平描图，呈现倒 U 形状。

证明：根据  $n_{-1}^2 + n_1^2 = n_0^2$  可知  $n_{-1} \leq n_0$ ， $n_1 \leq n_0$ ，所以发展中地区努力程度最高。其他两类地区努力程度相对较低。

性质 2：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努力程度依赖于相对收益差距  $\Delta$ ，随着  $\Delta$  的增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  $n_1$  提高，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努力程度  $n_{-1}$  下降。

证明：将  $n_0$  标准化为 1，对 (2) 式前两个等式两边取对数得：

$$\begin{cases} \ln n_{-1} + n_{-1} = \ln(1 - \Delta) \\ \ln n_1 + n_1 = \ln \Delta \end{cases} \quad (3)$$

利用关系式  $\ln x \approx x - 1$ , 则有:  $n_1 = \Delta/2$ ,  $n_{-1} = (1 - \Delta)/2$ , 则性质 2 得证。随着收益差距  $\Delta$  的扩大, 落后地区努力程度下降, 陷入“破罐子破摔”的恶性循环, 而发达地区被诱导出更大的努力水平。

可以看出, 发展中地区的努力程度最高, 其面临的地区竞争压力也最大: 一方面要担心追随者赶上, 另一方面又要实现追赶领先者的目标; 相反, 对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而言, 仅仅需要实现追赶的目标或保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就行, 所以相应的努力水平也相对较低。竞争压力的不同来源导致面对竞争时的不同刺激反应。如果按照地区发展水平进行描图, 努力水平正好呈现倒 U 形的轨迹。倒 U 形轨迹下的不同地区不同努力水平的结论并不需要初始的禀赋水平或规模报酬递增(陆铭等, 2004)等特殊的假设条件; 动态而言, 如果我们强化现有的激励机制, 例如现有的以 GDP 发展水平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晋升, 那么对落后地区而言, 再多努力虽然可以获得晋升, 但是由此带来的政治收益的增加却非常有限( $1 - \Delta \rightarrow 0$ ), 理性的选择是减少努力水平。

### 三、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1. 计量方法选择。为了研究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影响模式, 首先我们研究分权的总体效应, 然后按收入水平将各个地区进行分组, 并进而分析分权的组别效应。根据这一研究要求, 本文采用县级面板数据, 回归方程如式(4)所示:

$$\text{rate}_{it} = \beta \text{fd}_{it} + \Theta \text{X}_{it} + \mu_i + \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text{rate}_{it}$  表示第  $i$  县  $t$  时的经济增长率,  $\text{fd}$  表示相应财政分权指标,  $\text{X}$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向量,  $\mu_i$  为各个地区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 这种个体效应可能是特殊的地理或气候环境, 也可能是较为优越的政策优惠或其他因素。方程具体估计方法依赖于不可观测效应  $\mu_i$  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可观测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 OLS 估计将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产生偏误, 为消除个体效应, 可以分别采用组内去平均的固定效应估计或者一阶差分固定效应估计; 反之, 如果不可观测效应  $\mu_i$  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虽然传统的 OLS 估计将产生一致的估计量, 但是标准误将被低估, 一个有效的、一致的估计量是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实证研究中又称为随机效应估计量。根据 Hausman 检验可以对两估计量进行选择。同时, 由于地区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关系的复杂性, 因此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处理, 工具变量的选择为各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

2. 财政分权指标衡量与数据来源说明。经验研究中较为广泛采用的刻画财政分权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分成率指标; 二是采用地方财政收入、支

出占中央相对比重的指标。两类指标的刻画都存在值得探讨的地方,财政分权作为一种体制安排,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从而影响经济参与人的行动空间,但是像所有的制度因素一样,作为一项较为稳定的制度如何通过相关的指标刻画,是现有研究的困难。本文采用第二类的指标度量,主要原因是基于区县数据的可采集性。同样理由,本文数据采用预算内收入、支出,而没有包含预算外和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张晏、龚六堂,2006),模仿 Zhang (1998)的做法,我们采用下面两组四个指标反映财政分权的影响。

收入指标:本文分别采用  $fd_{si}$  和  $fd_{ci}$  两个指标从地方财政收入的角度刻画财政分权的程度。前者定义为县财政收入与县生产总值之比,这一指标反映在既定收入水平下,地方财政的自由度;后者定义为县财政收入在全省所占的比重除以县国民收入在全省所占的比重,其中县财政收入占全省的比重定义为县财政收入比上省财政收入。Lin (2000)指出,如果使用省财政收入/支出比上全国财政收入(支出)作为省财政分权指标是不合理的, Lin 的批评同样适合县级的数据,有些地方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政收入比上全省财政收入显然也会相对较高,但是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其财政分权程度,所以我们用财政收入在全省的相对位置比当地经济收入水平在全省的相对位置,通过这种方法来消除地区经济规模的影响。

支出指标:类似于收入指标,我们使用县财政支出与县生产总值之比  $fd_{se}$ ,同样为了消除地方经济规模的影响,定义  $fd_{ce}$  为县财政支出在全省所占的比重再除以县生产总值在全省所占的比重。

方程(4)中的控制变量 X 包括:(1)资本积累:由于缺少对县级资本存量的直接估计,本文直接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作为资本积累增长的指标;(2)劳动力:我们使用城镇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刻画劳动力的增长,这主要是考虑到农村地区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直接使用包含农村人口的劳动力指标并不能反映劳动力变化趋势;(3)不同的地理要素条件对区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使用可耕地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比例来刻画这类地理因素的影响;(4)预期到城镇化比重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可能越快。所以我们选择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之比的这一城镇化比重指标。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县级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概要》和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直辖市的各指标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剔除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数据区间为 2002—2005 年,计 1 997 个截面单位。

#### 四、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1. 分权效应的实证结果。利用(4)式的回归方程,表 1 是实证回归的结果,为消除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同时为刻画分权

对区域后续经济增长影响,我们取四个分权指标的一阶、二阶滞后的平均值。由于各省特质变量显然与解释变量相关,所以我们直接报告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同时还报告了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的 Hausman 检验,表 1 列出了各种分权指标下的估计结果。

表 1 县级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FE	FD	FE	FD	FE	FD	FE	FD
fd <sub>4t</sub>	31.34*** [10.77]	32.29*** [11.17]	--	--	--	--	--	--
fd <sub>3t</sub>	--	--	1.95*** [10.08]	2.03*** [10.63]	--	--	--	--
fd <sub>2t</sub>	--	--	--	--	9.27*** [12.97]	9.16*** [5.61]	--	--
fd <sub>1t</sub>	--	--	--	--	--	--	1.47*** [12.91]	1.47*** [12.30]
capi	0.129*** [6.12]	0.122*** [5.61]	0.129*** [6.11]	0.125*** [5.57]	0.121*** [5.90]	0.119*** [5.61]	0.115*** [5.55]	0.115*** [5.38]
empl	-0.086* [-1.69]	-0.092* [-1.78]	-0.091* [-1.77]	-0.0965* [-1.87]	-0.077 [-1.56]	-0.080 [-1.59]	-0.086* [-1.72]	-0.087* [-1.71]
area	0.55*** [5.36]	0.56*** [4.96]	0.55*** [4.85]	0.56*** [4.92]	0.56*** [5.13]	0.56*** [5.15]	0.56*** [5.04]	0.56*** [5.05]
city	0.256** [2.39]	0.258** [2.40]	0.275** [2.55]	0.276*** [2.56]	0.263** [2.54]	0.266** [2.55]	0.291*** [2.81]	0.292** [2.79]
cons	-1.24*** [-11.72]	0.104** [3.68]	-1.149*** [-9.53]	0.114*** [3.99]	-1.38*** [-12.34]	0.043 [1.53]	-1.45*** [-12.34]	0.0113*** [0.39]
Wald	735.39	304.67	700.67	281.10	915.95	427.56	882.11	398.20
Hausman	463.53	--	357.68	--	1399.12	--	668.87	--
N	2933	1363	2932	1362	2934	1364	2933	136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z 统计量。FE 表示固定效应估计量;FD 表示一阶差分估计量。表 2、表 3 同。

由表 1 可见,在本文构造的四个分权指标中,分权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由于各个指标反应分权的不同侧面,所以四个系数本身并不具有可比性。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 1 分别列出了组内去平均的固定效应估计量和一阶差分的固定效应估计量两种估计结果。检验结果表明:系数并没有随着估计方法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且两种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显著支持区域内部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后, Hausman 统计量支持了我们对固定效应估计的选择。

对各控制变量的解读还发现如下几点结论:

(1)除了就业的系数,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均符合预期,资本投资增长率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快,资本投资 1% 的增长,平均而言可以带动当地经济 0.12% 的增长,可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拉动依然是重要途径之一。(2)反应地区禀赋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两个指标即可耕地面积比重

和地区城镇化比重也完全符合预期,城市化水平越高、可耕地面积比重越大的地区,后续的经济增长率越快。(3)对比负的劳动力就业系数和显著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系数,表现出区域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型特征和经济增长效率的低下:一方面投资依然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引起就业水平的增加。

2. 倒 U 形曲线及其解读:是阶段性竞争压力异同还是规模报酬递增? 在获得正的分权效应后,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分权是否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系统性变化,由于分权指标  $fd$  与其平方项之间有 95% 以上的高度相关性,所以本文无法利用添加平方项的方式检验倒 U 形的非线性关系。为此,本文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大小将样本分为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高收入组三个组,并对三个组的数据单独进行估计,分别检验其分权效果。表 2、表 3 分别列出了分组估计的结果。在各个组别中,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然为正,除了(3)、(4)组中的低收入组分权系数不显著异于零,其他系数均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四组回归方程中,投资增长率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 2 收入指标分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fd_{si}$	5.56*** [2.37]	43.91*** [6.65]	34.55*** [11.12]	--	--	--
$fd_{ci}$	--	--	--	0.262* [1.63]	2.63*** [6.01]	2.26*** [11.08]
$inves$	0.032*** [3.15]	0.134*** [6.26]	0.145*** [10.41]	0.0329*** [3.19]	0.137*** [6.37]	0.151*** [10.80]
$empl$	-0.0002 [-0.05]	-0.047 [-2.92]	-0.0179 [-1.02]	-0.00005 [-0.01]	-0.049*** [-3.04]	-0.016 [-0.94]
$area$	0.04*** [10.44]	0.0053*** [3.37]	0.0067*** [3.58]	0.040*** [10.47]	0.005*** [3.36]	0.006*** [3.53]
$city$	-0.25*** [-3.21]	0.026 [0.30]	0.146*** [3.16]	-0.25*** [-3.23]	0.055 [0.62]	0.149*** [3.23]
$cons$	-0.69*** [-6.02]	-1.625*** [-6.38]	-1.34** [-10.56]	-0.62*** [-5.36]	-1.54*** [-5.76]	-1.38*** [-10.57]
F	30.50	26.47	65.47	29.74	24.59	65.16
N	1 098	1 124	970	1 098	1 124	969

对表 2、表 3 的解读可以获得如下两点基本结论:

(1) 根据收入水平进行划分,分权增长效应呈现明显倒 U 形:无论采用哪一组指标衡量财政分权,对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县市,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最好;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分权的生长效应并不明显,部分指标中甚至不显著地异于零。整体而言,分权的生长效应随收入水平变化呈现倒 U 形曲线状,见图 2。这和文章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完全吻合。分权带来的竞争效应并不会一视同仁地促进各个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不同层次的地区面临不同的竞争压力,进而诱发出不同的努力水平。相对而言,中等地区面临的竞争压

力最大,这部分缘于中等收入地区急于摆脱落后地区的追赶,部分缘于中等地区希望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而其余两个地区仅需要面临两种压力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表现出分权增长效应的倒 U 形曲线状。图 2 是按照表 2、表 3 的组别估计结果绘制的分权效应曲线。

表 3 支出指标分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3)			(4)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fd <sub>sc</sub>	0.36 [0.78]	17.67*** [9.50]	11.77*** [17.86]	--	--	--
fd <sub>cc</sub>	--	--	--	0.049 [0.74]	3.33*** [10.85]	2.23*** [18.99]
inves	0.033*** [3.19]	0.114*** [5.47]	0.124*** [10.08]	0.033*** [3.17]	0.107*** [5.26]	0.119*** [9.91]
empl	-0.0001 [-0.03]	-0.041*** [-2.63]	-0.012 [-0.81]	-0.0002 [-0.05]	-0.042*** [-2.76]	-0.01 [-0.66]
area	0.040*** [10.50]	0.0048*** [3.17]	0.0064*** [3.91]	0.040*** [10.51]	0.0045*** [3.05]	0.006*** [3.99]
city	-0.247*** [-3.15]	-0.12 [-1.37]	0.179*** [4.54]	-0.245*** [-3.11]	-0.12 [-1.41]	0.17*** [4.46]
cons	-0.55*** [-4.31]	-2.19*** [-9.16]	-1.106*** [-14.69]	-0.536*** [-4.69]	-2.86*** [-10.56]	-1.52*** [-17.00]
F	29.22	37.05	122.17	29.21	43.39	133.53
N	1 098	1 124	971	1 098	1 124	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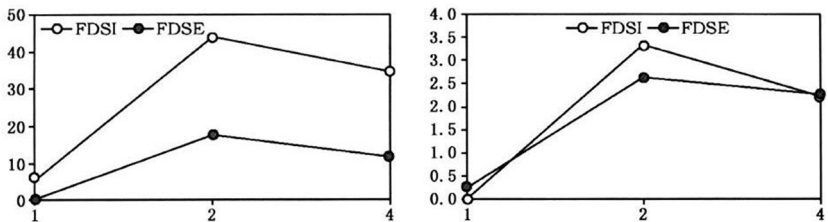


图 2 分权效应的组别效应

(2) 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不能完全解释倒 U 形曲线,阶段竞争压力不同是倒 U 形曲线的重要因素:为了对这一基本结论进行分析说明,我们首先看资本产出效应。资本并没有表现出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相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投资的增长效应表现出一个增长的趋势,即发达地区投资效果远远高于落后地区投资效果,见图 3(根据表 2、表 3 估计结果绘制)。陆铭等(2004)曾经指出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与落后地区政府努力水平下降的一种可能性联系:即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报酬递增使得发达地区同样的投入带来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拉大。如果经济增长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落后地区明知无法实现追赶(本文中表现为  $p_{-1}$  较低),此时合理的选择可能是放弃追赶,转而追求其他方面的收益。图 3 中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增效应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但是上述推论和图 2 之间存在一些不吻合的地

方：如果上述推论成立，即经济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可能性，那么按组别划分的分权效应曲线同样应该呈现增长趋势，而不是倒 U 形趋势！倒 U 形分权效应曲线的存在恰恰表明：完全的规模报酬递增假说无法单独解释为什么发达地区的分权激励反而不如发展中地区的分权激励？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正是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阶段性竞争压力”假说，发达地区分权效应之所以低于发展中地区的分权效应是因为发达地区面临的竞争压力低于发展中地区的竞争压力。前者仅面临保持领先优势的压力，但是后者却面临追赶和保持对落后地区优势的两种竞争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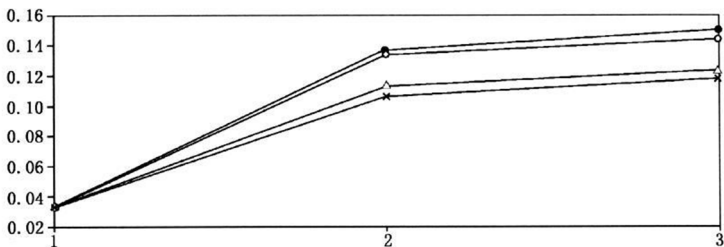


图 3 投资效应的组别效应

## 五、研究结论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本文研究的主题。本文在一个区域政府“相互赶超”的模型中指出：财政分权结合以 GDP 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治“锦标制度”在带来地方政府努力水平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使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从而导致分权效果随着地区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出系统性的、可识别的变化模式。即分权的增长效应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 U 形曲线。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分权导致的竞争对不同层次地区产生的竞争压力不一，不同压力程度进一步诱发出地方政府不同的努力水平。

静态而言，分权对中等收入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因为对中等地区而言，竞争不但意味着对发达地区的追赶，还意味着不被落后地区赶上，所以双重的竞争压力诱发出中等收入地区的最大努力水平；但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则不同，落后地区仅需要实现对上一收入层次地区的追赶，如果追赶无望，或收益有限，它们将会主动降低努力水平，寻求体制外的收益来源；对发达地区而言，虽然一旦被赶超，意味着领先的优势将会消失，但是由于发达地区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不被对手赶超就行；动态来看，这种相对的排序位置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以 GDP 为核心的考核机制的强化，对落后地区而言，晋升后的收益水平的相对下降将会诱发其努力水平的下降，但是无论如何，改变的仅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相对位置，中等收入地区的相对最

高努力水平并不发生变化。

我们的研究说明财政分权通过引进地区竞争、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政策的指导上,我们认为如果离开竞争讨论分权还是集权,应该实行什么程度的分权毫无意义;财政分权本身并不会带来增长,分权是通过引入地区竞争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但是竞争又并不必然意味着增长,竞争也并不意味着相同的经济增长。既然如此,重点就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来保证竞争的促进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而不是其他。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制定考核的指标、考核的方式以及谁来考核,这是竞争的风向标。

参考文献:

- [1] Cai, Hongbin, Daniel Treisman. 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 3: 817—830.
- [2] 张晏, 龚六堂.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06, (1): 75—108.
- [3] 陆铭, 陈钊, 严冀. 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J]. 经济研究, 2004, (1): 54—63.
- [4] Philippe Aghion, Nick Bloom,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Peter Howit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2): 701—728.

## Research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Inversed-U Effect Curve

DING Cong-ming<sup>1,2</sup>, CHEN Zhong-chang<sup>1</sup>

(1. School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3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Coul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Could decentralization which ignore regional differences,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level? By building up a regional chasing-up model,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combined with rank-order tournament which use GDP growth as the main assessment index,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eads to competition pressure as well as dissimil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ctions. And consequently, growth effect of decentralization is showed as an inversed-U curve. The inversed-U curve states that competition due to decentralization causes different pressure 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pressure sources may induce different implementing levels by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national county-level panel data and four type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dicators, the above deduction has been proved.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mpetition effects; inversed-U curve

(责任编辑 许 柏)